责编：泰阳　E-mail:ccps6235@126.com　Tel:010—62806235　　2014年8月11日

军事战略

甲午之战败在国不能战军不能战

□钟少异

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距清顺治元年1644年刚好250年，清朝已经走到了末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也走到了尽头，这是一个王朝的末世，同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处在这样一个末世，整个国家腐朽不堪，整个军队也腐朽不堪，以致国不能战，军不能战。其结果就是甲午战争的惨败。

现在有一种观点可能夸大了战前洋务运动的意义，所谓同光之世有中兴气象，洋务运动好像使国家进入了近代化发展的轨道。实际上不是。我们必须看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外患内忧不断加剧，列强不断入侵，中国一败再败，太平天国又搞得国家元气大伤。在此情况下出现了一些变革图强的行动，试图振衰起敝，却步履维艰，很不成功，根本没有扭转颓势，所以1894年的清朝实际上处在末世的状态。甲午之败，不过是加速了清朝的覆亡。

国不能战突出体现于两个方面

领袖集团腐朽无能。先看最重要的两个人。一个是慈禧，她精于宫廷权术，但在知识和眼光上都很欠缺，谈不上什么眼界，更无经邦济世的才略，跟清初的孝庄和唐朝的武则天没法比。另一个是光绪，他长在深宫之中，还是个文弱青年，有抱负有激情，但没有韬略雄才。次看清廷，是中枢无人。太平天国之后满族人才凋零，围在慈禧、光绪身边的满族权贵都才智平庸，比较突出一点的恭亲王奕䜣实际也才略平平，只是手段比较圆熟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满臣对汉臣的忌防更甚了，所以晚清汉臣中的强人基本进不了中枢，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都被挡在外围。再看实际表现。从长远来说，就是看不到世界近代化的潮流，不知道这个时候已经是工业文明兴起要替代农业文明，资本主义兴起要取代封建制度，他们根本看不到这样一个大势，也就不知道引领国家走向正确的方向，赶紧跟上时代的步伐。从中期来说，就是看不到日本崛起速度之快、威胁之急，还一直以为日本是弹丸之邦，“蕞尔小国”而已，不能切实加强防范。1888年北洋海军宣布成军后便停止了发展，而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加速推进对清朝的战争准备，大力加紧发展海军。从近前来说，就是当朝鲜危机发生、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毫无领导、统驭这场斗争的能力。中枢诸公昧于情势，不知彼也不知己，拿不出有效的应对之策和周详的计划，反而为是战是和争论不休。慈禧先是看群情汹汹、愤激昂扬，便支持开战，还以为能轻易取胜，但初战失利，马上要到她六十大寿的日子（1894年11月7日，农历十月初十），就想赶紧了结，免得耽误做寿。朝中上下也把慈禧做寿看得比前方战事还要紧，甚至将旅大危殆的十万火急军情延搁不办。光绪坚决主战，但不知道怎样通盘进行谋划和组织，对日本战略意图和日军虚实毫不了解，只是一厢情愿地让军机处一道又一道下谕旨，催促各军速速进剿，似乎军队开到前线就能轻松把日军从朝鲜赶到海里，而当战事失利，战局吃紧，就乱了方寸，应对无措。

中央集权严重削弱，形不成国家的统一意志和统一力量。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清朝的经制兵八旗和绿营一败涂地，只好靠地方募勇练兵拒敌，湘军、淮军由此而兴，督抚势力随之坐大，中央集权严重削弱。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还能坚守道统，自裁其军，自我收敛，其他督抚却纷纷起来了，派系林立，借着办洋务图自强、筹海防或谋塞防而各练其军，各抱山头，明争暗斗，中央一统军令政令的局面名存实亡，甚至新建的海军也分别成了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的家底，所以南洋舰队和北洋舰队一直无法统一调遣使用。于是当大危机来临时，封疆大吏各顾私利各打算盘，互相钩心斗角，国家形不成统一的意志和力量。甲午战争爆发，情况就是这样。握有清朝主要军力和资源的许多督抚大员认为，这主要是李鸿章北洋系统的事，与己无干，非但不愿出钱出力，有的还存心看李鸿章的笑话。而作为战区司令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则是当时最大的地方实力派，清廷也不能顺畅掌控和指挥。应该说李鸿章的大局观是比较好的，但也有浓厚的北洋意识，他从一开始就想尽量避免战争，想缓战，这既是因为他对敌我情势相对还比较了解，也是出于保存北洋实力的派系心结，这与光绪是相左的，光绪指示军机处要打，快打。这样两种意见，只要能统一，按照一个决心进行筹划和执行也许还好，但就是形不成统一意志。光绪没有绝对的权力，事事要慈禧首肯才能执行，所以李鸿章对光绪通过军机处下达的命令能拖就拖，而李鸿章事权不出北洋，无法调动指挥全局，他想避战、缓战的主张光绪又不同意。上下不能同心同德，国家已经不是一盘棋。

上述状况，使得清廷的危机处理、战争准备和应战，都茫然无绪，一误再误。

军不能战突出体现于三个方面

组织混乱。由于没有准备，仓促应战，清军的战争组织和实施，从指挥机构的组建、作战计划的制定，到兵力的调动部署、军需的前运后送，都非常混乱。当时的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说：“我们对于战争毫无准备，实在令人可惊。”但更严重的问题还出在军事体制上。晚清军队的体系非常杂乱，都是一个个山头，没有统一的国防军，没有统一的司令部、参谋部。洋务运动买了一些枪炮舰船，仿造了一些枪炮舰船，看似搞近代化，但军队近代化最重要的东西都没搞起来。军队大多掌握在各地的督抚将军手里，临时从各地抽调过来，都有严重的私属性，都是督抚将军的私兵，平常不配合，到了战场上更难配合，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形不成有效的组织和协同。日军进攻辽东，一共投入四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不到五万人。清军调集到鸭绿江至山海关内外进行防御的先后有十几万人，但体系庞杂，多头指挥，互相观望，尔忌我虞，尔前我却，胜不相让，败不相救，一仗一仗都轻易败给敌人，日军打哪儿克哪儿。又如威海卫之战，防守威海军港和要塞的是李鸿章北洋系统的部队，水师由丁汝昌指挥，陆上要塞部队由戴宗骞指挥，威海附近还有二万多清军归山东巡抚李秉衡指挥。李秉衡始终不积极调兵增援威海，威海的戴宗骞和丁汝昌也矛盾重重，各行其是，结果陆上防御很快溃散，炮台尽失，陷北洋水师于绝境。诗人黄遵宪痛心而泣：“噫吁戏！海陆军，人力合，我力分！”清军组织上的混乱使得部队数量虽多，但形不成合力，兵力似厚而实单。

指挥无方。首先不知彼。上上下下都不了解日军的战略意图和兵力虚实，对日军的进攻方向普遍判断不清，处处设防，兵力分散，行动盲目，左支右绌，陆海两个战场都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其次不知战。战区司令李鸿章，后来战事不利清廷又调宋庆、刘坤一来加强，从他们以下陆军的各级军官大多是旧行伍出身，只有之前对太平军、对捻军的作战经历，基本不懂近代战争。海军系统好一些，官佐大部分是新学堂培养的，有一部分还留洋学习过，但也都没有近代化战争的实战经验。因此，清军在战略战术上表现出严重的无知。如不重视争夺制海权，不懂得陆海协同，不知道抗登陆作战。日军两次登陆，一次在辽东半岛，一次在山东半岛，都大摇大摆地进入，清军根本不组织防御。再如要塞攻防，北洋海防体系经营了一二十年，李鸿章曾自诩“有深固不摇之势”，但打起仗来旅大和威海的要塞都形不成严密防御，特别是陆上的后路防御空虚，一攻就破。基本的陆军战术大部分军官也不懂，如炮兵不知道集中使用，聂士成就说日军炮兵每战必聚在一处，清军的火炮则分散在各部队；只知道正面对抗、集群冲锋，不知道迂回侧击、侧翼防御，经常是日军一迂回侧击，清军的防线马上就垮掉；不会散兵战术，日军火力那么猛，清军还像打太平军、打捻军一样，经常集群冲锋，结果被敌大量杀伤。海军将领虽然学了近代海战的技术和战术，但实战灵活运用能力差，应变能力弱，几次海战的组织指挥都很不理想。

斗志不坚。晚清官场腐化，社会风气败坏，军队也腐朽不堪，纪律废弛，训练虚浮，赌博、狎妓、抽大烟等淫逸之风盛行。海军稍好些，但这些现象也很普遍，所以整个军队精神萎靡不振，战斗意志不坚，从上到下，临阵脱逃者比比皆是，在日军主攻方向上几乎所有的战斗都坚持不了一天以上，所有号称坚固的要塞——大连、旅顺、威海都是被日军轻易夺取。特别是许多将领带头逃跑，导致部队很快溃散甚至不战而溃。如：平壤之战总指挥叶志超带头逃跑，各路清军群龙无首，一溃而不可收，直到过了鸭绿江才算站住脚；大连守将赵怀业不积极战守，反而变卖军米做好逃跑的准备，日军担心大连要塞坚固，弹贮充足，准备以联合舰队从海上助攻，但攻击还没发起，赵怀业就连夜率人马遁往旅顺，把要塞、军港和大量军需物资拱手让给了敌人。在清军参战各部队中，北洋海军是打得最英勇的，多数管带和提督丁汝昌与战舰和舰队共存亡，以身殉国，但也有一些将领和军舰临阵脱逃。最可悲的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由于陆上战场和防线的全面溃败，北洋水师这支清军最先进的部队也被彻底葬送。

甲午战争，初战海军是关键，终战陆军是关键。北洋海军不败，日本不敢肆无忌惮地扩大侵略；清朝陆军不败，中国不会速败、完败。“诸军灞上怜儿戏，万里神州痛陆沉。”海上和陆上都打不赢，这是晚清的悲哀。

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不少西方人估计，初战中国要吃亏，久战则日本会失败，因为清朝没有战争准备，而日本蓄谋已久，进行了长期的准备，但日本明治维新时间还不长，国力还不强，不具备长期支持战争的能力。日军突破鸭绿江攻入辽东之后，李鸿章、刘坤一等也曾提出，为今之计需做长久相持的打算。但由于清朝的末世状态，国家和军队均腐朽不堪，与敌较长久地相持都做不到。在经历了战场上的速败之后，腐朽无能的清廷很快选择了投降路线，通过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来换得苟延残喘，这是国不能战、军不能战的极致表现，也是国不能战、军不能战的必然结局。

外军动态

借力联盟：德国军队转型之路

□汤俊峰

作为“日耳曼战车”的德国联邦国防军的发展走向始终是世界关注的重点，其转型理念也代表着西方国家军事改革的动向和发展趋势。面对国际战略格局和国家安全环境的新变化，德国军队启动了多轮以打造现代军事体系为指向的军事改革，这些转型不仅拓展了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了武装力量结构和规模，赋予国防军新的使命，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借力于联盟，逐步建立以德国为主导的欧洲秩序和安全机制，最终达到维护自身安全和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长远战略目标。

以联盟为基点推进国家安全战略不断转型。国家目标决定军事需求，国家战略是军事转型的基本依据。由于二战的历史原因，追随联盟、以退为进，是战后德国不得已而为之的国家策略，因为战后形势不允许德国有自己的外交政策、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无权单独使用武装力量，甚至经济政策也要受制于战胜国。同时，作为战败国，德国孤立于北约与华约两大集团之外，军事安全就更没有保障。为此，德国选择加入西方联盟和北约，把“没有联盟就没有和平的保障”作为信条，实施“前沿防御”战略，甘愿作为北约“灵活反应”战略的一个“马前卒”，把武装力量指挥权上交北约，这样使自身安全有较好屏障，也具备了发展防务力量的理想环境。随着冷战结束，德国统一，不仅完全恢复主权，而且实力大大增强，随着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加入北约，德国东边出现了一条战略缓冲地带，德国地缘战略位置发生巨大变化，欧洲“心脏”战略地位突显。为避免欧洲其他国家担忧，也为了通过对盟国的安全贡献以增加自身安全系数，以及更好借助联盟参与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事务，扩大自身影响力，德国仍然选择在联盟体系下发展，反复声称德国是“欧洲的德国”，要保卫德国及其盟国的安全，一直与北约、欧盟、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及联合国联手合作，承诺向北约、欧洲提供军队。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实行“联盟政策”，并不是决心要牺牲自主权以换取国家安全，而是要通过联盟这个平台，谋求和享有与其他大国平等的权利和地位，进而获得欧洲事务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事实上，近年来，德国利用其欧洲各联盟组织的成员国身份及经济、外交等优势游走于各大政治体之间，在国际上享有越来越高的威望，也受到国内民众认可，甚至在伊拉克等问题上敢于对美国说不。此外，德国借助联盟这个平台，是为了更好地在欧洲地区进行防务参与和防务合作，在北约框架内进行国际军事参与和国际军事合作，在联合国机制下参加国际维和行动，以改善德国国际形象，为今后成为世界大国打下基础。更直接的考虑是，提高国防军应对信息化战争和多元化安全威胁的能力，为德国在海外作战提供经验，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国际较量作准备。所以，德国安全战略始终是在联盟基础上发展和深化的，德国国防军转型也是沿着这条主线展开的。

> 德国实行“联盟政策”，是要通过联盟这个平台，谋求和享有与其他大国平等的权利和地位，进而获得欧洲事务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在现代信息社会，军事系统不再是一个闭合的孤立体系，而是开放的、面向未来的、与现代社会大系统紧密互动的有机系统。

构建在联合和跨机构行动中的动态能力框架。适应变化中的任务需求，打造新的能力结构是现代军事转型的一个基本着眼点。德国联邦国防军的任务范围从高强度作战一直延伸到低强度的维和任务和人道援助，要求武装力量具备多样化的行动能力。由于长期参与北约、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联合国赋予的多样化任务，给德国联邦国防军提供了检验在联合框架下执行多样化任务能力的机会。同时，国际安全态势的发展变化，欧洲组织要求德国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大作用的呼声，以及在执行国际任务中出现的问题教训，对国防军打造现代军事体系提供了方向指引。国防军认为，要在联合框架下保持持续的军事能力以全方位地完成不同任务，必须具有新的动态的能力结构。这个能力结构由6大相关能力构成，即指挥控制能力，情报与侦察能力，机动能力，有效交战能力，支援和维持能力，生存能力。国防军将动态的能力框架作为军事转型的核心要素来看待，作为确定部队结构、规模、编成等方面的基本依据。在这些能力类别当中，国防军不要求“齐步走”，而是根据任务特点和实际情况重视精选其中两三种能力。同时强调能力互通性，认为互通性是将所有能力融合在一起的黏合剂，是联合和多国行动的关键，是形成全频谱行动能力的基础。

强调能力、效果和灵活性的部队类别及相应体制编制改革。功能决定地位，能力决定类别。从能力视角确定部队类别，是现代军事转型和危机管理的重要原则。为使联邦国防军更好地适应新的安全环境和基于联盟的多样化任务要求，联邦国防军于2006年颁布《德国安全政策和联邦国防军的未来白皮书》，针对传统大规模常规入侵的本土防御性结构已不适应现实的安全政策需要的现实，对国防军进行全面改组，将原来按功能划分为危机反应部队、主要防御部队和军事基本组织的结构改为干预部队、维持稳定部队和支援部队。2010年开始，联邦国防军启动新一轮军事改革，将部队类别按照反应部队、稳定部队、保障部队的类别进行调整。反应部队，由装备精良、反应最迅速、具备联合指挥的部队以及能够遂行应急作战的特种部队组成，主要用以实施复杂、高强度环境下的合成、联合和基于信息网络的作战和行动。稳定部队，用于为冲突的政治解决和国家建设任务打基础，根据它们最可能实施的低强度行动进行训练、编组和装备，建制作战分队具备升级潜力。保障部队，为反应部队和稳定部队所实施的行动提供指挥与控制、军事警察部队、后勤、卫勤支援、测绘等必要保障。为与新的部队类别相适应，特别是由于德国国防预算收缩，联邦国防军对军队系统进行了收缩和重组。首先调整指挥机构，重组国防部和联邦管理局，赋予总检察长对军队的指挥权，大幅裁撤负责军队人员的管理和物资供给职能的联邦国防管理局。其次，对军队体制编制进行瘦身，以求打造更小型、更精简、更具能力的军事体系。按国防部计划，到2015年国防军将减至18.5万人，职业军人和长期志愿兵减幅达到14%，在不改变现有的相对比例前提下，人员裁减按比例在各军种中进行。由于陆海空结构发生变化，军事基地被迫缩编，总数由328个减至264个。废除实行55年的义务兵役制，取而代之职业化、全志愿兵役制，以实现武装力量的高度专业化，提高军队执行任务能力。

打造开放型的现代军事体系。在现代信息社会，军事系统不再是一个闭合的孤立体系，而是开放的、面向未来的、与现代社会大系统紧密互动的有机系统。推进武装力量这样的庞大组织成功转型，需要获得多方位、跨领域的系统知识和智力支持，甚至可以从其他大型现代组织的转型中获得经验。为确保国防军顺利转型，前国防部长德·迈齐埃授权11个项目小组专门研究改革细节，包括联邦国防军的重组、基础设施的调整和军兵种改革。联邦国防军还成立国防军转型中心，由250多名经验丰富、具有较强学术背景的校级军官或文职学者组成。从转型中心职能任务看，国防军注重构建的是一个开放的、自适应的、对变化反应灵敏的军事系统，是一个力求从概念发展，到试验发展与作战，到纳入国防军训练系统管理的完全链路，是一个从作战研究到未来分析的适应新技术与新挑战的发展系统，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开放军事体系。同时，国防军认为，在今天和未来的复杂冲突中，一个关键的成功要素就是获得冲突领域的系统的、跨领域的知识，而这一情况的出现和适当利用要依靠所有相关军事和文职行为体的努力，才能全面完成各冲突领域的战略使命。事实上，国防军的整个运作模式也体现了开放系统的特征，他们强调武装部队和行政机构只注重完成核心的和维护主权的任务，其他方面通过与商界和工业界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等形式，运用一系列现代管理思想、方法和手段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并发掘机构和技术的最大潜力来使其运作程序更具费效比，通过成立联邦执行集团承担信息技术、车队管理、不动产管理和服装供应等业务，从制度上系统上提高联邦国防军现代管理水平，保证联邦军队核心使命任务的完成。

军事理论研究要为打胜仗服务

□赵勤轩

兵圣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作为战争指导的军事理论，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学问，是具有严谨、系统、科学、实用、对抗性的知识体系。20世纪后半叶以来，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电脑、互联网广泛应用，战争进入信息化时代。军事学者理论研究十分活跃，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其中也有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提出来共同讨论。

从战争实际出发 避免华而不实的概念游戏

认识来源于实践。军事理论研究要从现代战争和中国军事力量实际出发，知己知彼，实事求是，概念明确，逻辑清晰，具有可操作性。近来战争形态、作战方式的研究，似乎缺乏这些军事理论应有的品格。脱离战争实践，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没有确实的科学的根据，或跟着美国媒体的新奇概念随声附和，或凭主观想象闭门造车。例如未来战争形态、作战方式是怎样的？所谓信息化战争，普遍认为是在现代军队和武器系统中普遍应用信息技术和网络攻防的战争。有些军事专家脱离现代军队和武器系统的实际，提出空权信息化战，网电空间战，生物基因战，战略心理战，信息心理战，信息思想战等等。未来战争究竟要打什么战？没说清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军事理论，只能使军队思想混乱，贻误“打胜仗”的战争指导。

在已有理论基础上创新 避免新瓶装旧酒

军事理论源远流长，有成熟的概念、体系和研究成果。战争史上不同军事技术时代的战争，如冷兵器战争，火药枪炮战争，机械化战争，产生了与其适应的军事理论。中国有《孙子》为代表的古代兵法，现代的毛泽东军事思想；西方有《战争艺术》《战争论》，马汉的制海权，杜黑的制空权。军事理论创新，要基于并高于已有的军事理论。近来热炒的创新战争理论，“将认知域作为信息化战争的一个基本领域”，提出“制脑权”“认知战”，“是对战争时空范畴的新界定”。其实不是什么新界定，是新瓶子装心理战的旧酒。

把握战争本义和军队职能 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战争是军事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战争的本义是政治集团为了核心利益以武力手段进行的最高斗争形式。生活中战争也引申为争斗的意思，如思想战争，货币战争，婆媳战争，这些不是军事理论的战争概念。军事理论是规范国家武装力量行动原则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国家加强武装力量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增强国防力量。军事理论研究要紧紧把握战争的本义和军队职能，才不会跑题，有现实的实际的指导意义。

现在一些军事理论研究，脱离战争本义和军队职能。把军事战略归结为意识形态上甘岭的争夺。军队是武装集团，不是文化集团。战争不以影响情感、意识为指向，是以打击和摧毁战争力量为目标。武装力量是铁扫帚，不是鸡毛掸子。战争暴力是人类搏斗的最高形式，洗脑并非全部有效。突破军事斗争范围延伸到和平时期的“作战形式”，是泛战争论，不符合战争基本定义和辩证法。军事理论不能模糊战争概念和军队职能，误导非武装化，弱化我军的战争目标和战争准备。通过制脑“操控一个国家促使其走向自我毁灭的彼岸”，多半是书斋经院式军事理论的幻想。

针对我军面临的战争 为打胜仗服务

军事理论的使命和价值，不在于提出新概念、构架、体系，而是为我军打赢可能到来的战争，提供理论指导。可以预见，在本世纪我军面临的战争，是以导弹、飞机、航母战斗群、舰船、特种部队为突击力量，由计算机、网络、数字化技术组合成一体化战场，常规的局部的信息化的精确制导、速战速决的战争。美军重返亚洲，针对我军提出了空军、海军、陆战队参加的实打实的“空海一体战”理论。

我军必须面对和准备打赢铁血的战争，这是军队本职所在。在东海和南海现实的战争威胁，我军航母等新装备服役，陆海空如何协同一体作战，对不同的敌人采取怎样不同的打法，需要相应的军事理论。军事专家不可避实就虚，要知难而上，按照军委要求“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深入探索“能打仗、打胜仗”实战化的军事理论，为打赢我军面临的战争做出理论贡献。

军事理论